



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浅论



韩 仝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系)

永乐元年(1403年),宁献王朱权移封南昌,开启了明代在江西建藩的历史。自此以后,各等级宗藩在受封区域之内营建墓葬。目前已经发掘、清理的宗藩墓葬表明,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呈逐渐简化的发展趋势,且相同等级宗藩的玄宫形制并不一致。本文结合相关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在玄宫形制类型分析的基础上,以造坟工价的变化为切入点,对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变化原因进行讨论。

一、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的玄宫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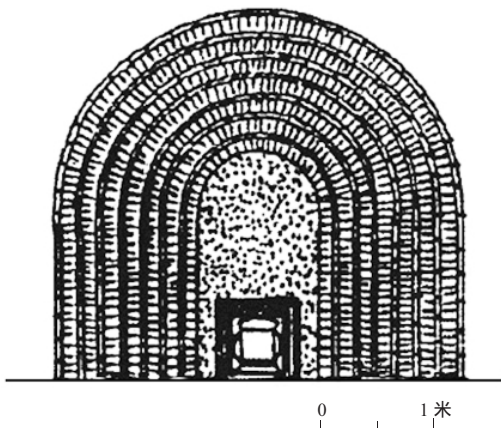
明代自皇太子以下的皇室成员,共分八个等级,各地宗藩,依等级分封有序。皇太子以下,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封亲王世子,其余众子封郡王。郡王嫡长子封郡王世子,其余众子封镇国将军。郡王之孙均封辅国将军,曾孙均封奉国将军,四世孙均封镇国中尉,五世孙均封辅国中尉,六世孙及以下均封奉国中尉。各宗藩墓葬的玄宫制度,也存在等级差别。

现已发掘、清理的明代江西宗藩墓葬有宁献王墓、宁康王墓等。根据墓室多寡,可将其玄宫形制分为五种类型:单室玄宫;二室玄宫;五室玄宫;七室玄宫;使用防腐物质将圻内砖墙与棺封筑为一个整体,以此代替玄宫的形制,即“灰隔”类墓葬。各类型中,不同等级玄宫形制有所不同(具体数据详见表一)。

1. 单室玄宫

亲王等级:宁藩第三任四代亲王宁康王墓(图一)。玄宫为拱券式圻室,棺外有青石板盖、墙、底,石板与圻室间以灰砂、糯米填筑。

亲王妃等级:宁康王元妃徐氏墓,形制同王墓。



图一 宁康王朱觐钧墓圻形正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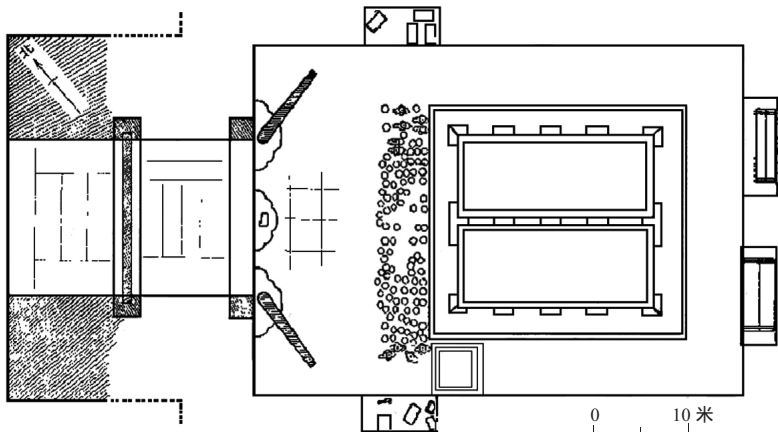
(引自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夫人等级: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吴氏系宁藩第二任三代亲王的夫人,玄宫平面为长方形,无封门砖,棺外墓室浇筑松香。

2. 二室玄宫

此类形制出现频率较高,现按等级排列于下:

亲王等级:益藩肇封王益端王及妃合葬墓(图二)。该墓凿山为陵,玄宫平面呈“凸”字形,益藩



图二 益端王及妃合葬墓平面图

(引自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第二世亲王益庄王及妃合葬墓，玄宫后室棺台上四面砌砖墙，墙内堆石灰，三棺置于石灰堆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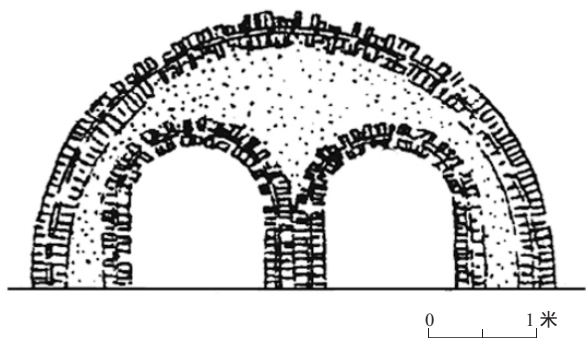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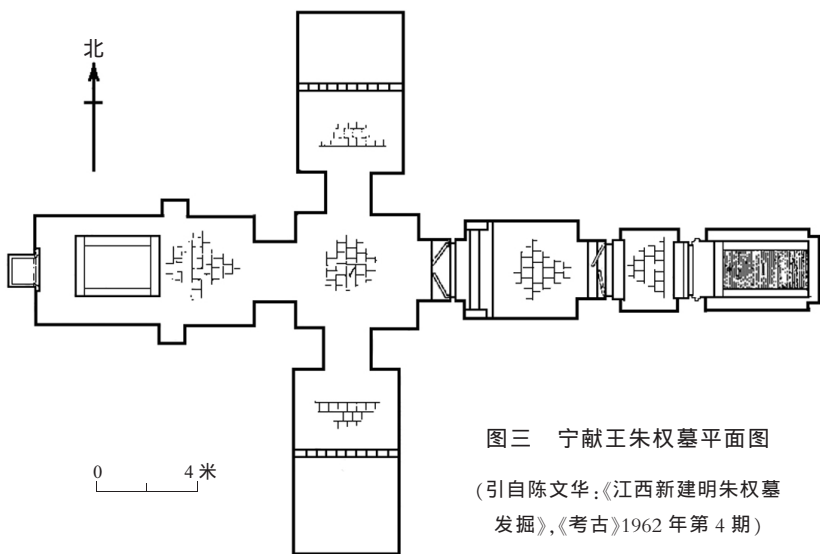
亲王妃等级：宁康王次妃，末代王朱宸濠生母之墓。

郡王等级：宁藩追封惠王之庶三子，乐安昭定王及妃合葬墓。

将军及夫人等级：瑞昌荣安王李镇国将军及夫人合葬墓，推测玄宫为前后两室。前室、甬道（调查报告中称为享堂、羨道）已全毁，砖砌圹室四壁；奉国将军妣淑人刘氏、妣太恭人万氏合墓，推测玄宫为前后两室。两圹左右并列，左圹砖砌圹室，右圹仅前室、甬道（调查报告中称为享堂、羨道）被毁少许。

3. 五室玄宫

宁藩肇封亲王宁献王朱权墓^⑩。其墓规模宏大，结构相对复杂，为前、中、后三主室、左右两耳室的五室玄宫（图三）。平面呈十字型，墓门外有礅礎



并设两道封门墙，前室之前有“次前室”，后室左、右、后壁各设一个壁龛。

4. 七室玄宫

淮藩肇封亲王淮靖王朱瞻埈墓^⑪。墓穴长29米、宽12米。并东西耳室共七室，具体形制不详。

5. “灰隔”类墓葬

自弘治朝开始，江西宗藩墓葬的玄宫内，逐渐增加对防腐物质的使用（见附表一），嘉靖朝以后，出现了用防腐物质将圹内砖墙与棺封筑为一个整体，以此代替玄宫的形制，在一些文章中称之为“灰隔”类墓葬。笔者同意这种观点，所谓“灰隔”类墓葬，即“先布炭末于圹底，筑实，厚二、三寸。然后布石灰、细沙、黄土拌匀者于其上……另用薄板为灰隔，如椁之状，内以沥青涂之，厚三寸许。中取容椁墙，高于棺四寸许，置于灰上。乃于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内，如底之厚筑之……复下炭灰等而筑之，及墙之平而止”^⑫。圹内砖墙及棺与砖墙内的填充物质，均属于《朱子家礼》中提到的“灰隔”。

具有此类特征的有：益藩第四任亲王益宣王及妃合葬墓^⑬，其墓圹内砌砖并以砖墙相隔置三棺，棺上各盖一板，浇筑石灰糯米汁呈覆斗状盖顶。益藩第六任亲王益定王及妃合葬墓^⑭、益藩罗川某郡王（瑞懿王朱常湑）墓^⑮、奉国将军朱宸濠夫妇合葬墓^⑯，此三墓与益宣王墓形制相近；昭定王奠垒之孙——辅国将军及其夫人卢氏合葬墓^⑰，石灰筑圹，具体情况不详。

另据一些资料显示，淮藩王大部分也采用石灰封筑墓室的形式^⑱。

除以上五种玄宫类型，还有一种将防腐类物质紧裹于棺外，或充实于墓室的特殊形式。宁康王及元妃合墓、宁靖王夫人墓、奉国将军宸洁及淑人合葬墓^⑲（图四）均属此类。笔者认为，该类型为玄宫形式发展的重要过渡，即墓室→墓室填充防腐物质→无墓室的“灰隔”类。

需要说明的是，益庄王墓属于二次改制。万历十九年（1591年）万氏“更殓易棺”迁葬于此，因发现墓室已布满虫蚁、棺木多朽，方采取这种补救措

附表一 明代江西宗藩墓葬形制

墓葬	墓主等级	入葬时间	封地	葬地	地宫形制	类型划分
淮靖王朱瞻塏墓	亲王(始封)	正统十一年(1446年)	淮藩		墓穴长29、宽12m,并东西耳室共七室。	七室墓
宁献王朱权墓	亲王(始封)	正统十四年(1450年)	宁藩南昌	新建	前、中、后三主室,左右两耳室,后室左、右、后壁各设一个壁龛,后室有棺台。全长31.7m,最宽处21.45m,后室高7.17m。平面呈十字型。	五室墓 无石灰封筑
乐安昭定王及妃宋氏合葬墓	郡王(惠王庶第三子)	弘治二年(1489年)	宁藩南昌	新建	砖砌券顶前、后二室,前室长5.37、宽3.49、高3.27m,后室长7.95、宽5.35、高4.13m,后室左、右、后壁各设一个壁龛,后室有棺台。	二室墓 无石灰封筑
宁康王朱觀鈞及妃徐氏合葬墓	第三任 四代亲王及亲王妃	弘治十年(1497年)	宁藩南昌	新建	单室券顶,砖筑墓室,长5.6、宽3.92、高3.67m。朱漆棺外有木外棺,外复有青石板盖、墙、底,石板与圹室间以灰砂、糯米填筑。徐氏墓位于王墓右侧,形制同王墓,略简单。注:距其墓西约6.2米处土阜边缘有元妃徐氏墓,结构与王同,灰砂、糯米填圹内,直接包裹棺木 ^③ 。	单室墓 堆填石灰
宁靖王夫人吴氏墓	亲王妃	弘治十七年(1504年)	宁藩南昌	新建	单室砖砌券顶,墓圹南北长4.1、东西宽2.7-3.48m,南北无墙,长2.52、宽1.32-1.6、残高1.6m。室内三合土圹底,以松香填筑墓室,紧裹木棺。	单室墓 堆填松香
宁康王次妃冯氏墓	亲王妃	正德十二年(1517年)	宁藩	新建	砖砌券顶前、后二室。前室长6.75、宽3.05、高3.35m,后室长8.52、宽3.09、高4.2m,后室有棺台,左、右壁各设两个壁龛。	二室墓 无石灰封筑
奉国将军宸洁及刘氏合葬墓	奉国将军及夫人	正德年间	宁藩	新建	墓室为券顶,大拱券下另有两个小拱券,大小券间以泥土填实。大拱券顶距地面2.5m,宽3.8m。两小拱各高1.2、宽1.1m。	墓室堆筑 泥土
益端王朱祐棨及妃彭氏合葬墓	亲王(始封)及亲王妃	嘉靖十九年(1540年)	益藩南城	南城	凿山为陵,砖砌券顶前、后二室。全长8.2m,前室长1.21、宽1.62、高2.12m,后室长5.2、宽3.62、高2.97m,后室左、右各一个壁龛,后壁设两个龛,后室石棺台上并排置二棺,各外套外棺。	二室墓 无石灰封筑
益庄王朱厚烺及妃王氏、万氏合葬墓	第二任亲王及亲王妃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	益藩南城	南城	砖砌券顶前、后二室。全长8.74m,后室左、右壁各设两个壁龛,后壁原设三个壁龛后被封堵。棺台上四面砌砖墙,高1.2m,墙内堆石灰,三棺置于石灰堆内。	二室墓 堆筑石灰
朱宸濠及陈氏合葬墓	宁献王玄孙封宜春奉国将军及夫人	嘉靖四十年(1561年)	宁藩	新建	圹内三棺,圹长3、宽4、高2.38m,三棺间隙用三合土填实,上各以三合土覆顶后用黄土夯实砌券顶。	“灰隔”类 墓葬
端惠王次妃孙氏墓 ^④	郡王妃	原葬于隆庆元年(1567年) 改葬于隆庆六年(1572年)	宁藩	新建	棺木起出后填平墓圹,圹形大小不详。	
益藩罗川瑞懿王朱常湑	郡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益藩南城		圹内二棺,砖砌隔墙,三合土筑圹室。左为空圹长2.9、宽3.3m。右棺室一棺,尸身注过水银。	“灰隔”类 墓葬
益宣王朱翊钊及李氏、孙氏合葬墓	第四任亲王及亲王妃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益藩南城	南城	砖砌圹室,内以砖墙隔开置三棺,各长2.4、宽1.04、高1.2m,各棺上盖一石板,以石灰糯米汁浇筑棺,覆斗状盖顶。注:左元妃右次妃	“灰隔”类 墓葬
益定王朱由木及妃黄氏、王氏合葬墓	第六任亲王及亲王妃	崇祯七年(1634年)	益藩南城	南城	砖砌圹室,内以砖墙隔开置三棺,各长2.42、宽1.05、高1.10m,各棺上盖一石板,石灰糯米汁浇筑棺及套棺,上盖一长大石板,长方形盖顶。注:左元妃右次妃	“灰隔”类 墓葬
奉国将军妣淑人刘氏、妣太恭人万氏合葬墓	奉国将军夫人	崇祯八年(1635年)	宁藩新建	新建	同墓异圹。两圹左右并列,左圹砖砌圹室。右圹仅甬道、享堂被毁少许,当为前后两室。	二室墓 无石灰封筑
镇国将军及夫人合葬墓	镇国将军及夫人		宁藩新建	新建	破坏严重。后室部分长4.30、宽4.20m,左、右、后壁各设一个壁龛,享堂、甬道已全毁,砖砌圹室四壁,室门有石柱、横梁。	
明端简王妃江氏墓 ^⑤	郡王妃		宁藩新建	新建	发掘工程甚小,墓圹形制不详。	
辅国将军锄芸及夫人合葬墓	辅国将军及夫人		宁藩新建	新建	石灰筑圹,无砖,圹室具体情况不详。	

* 一种说法,淮藩墓葬大多为石灰浇筑棺椁墓结构,可做为分析淮藩成员墓葬的地宫形式的参考资料。

附表二 明代江西宗藩等级与玄宫形制

	单室	二室	五室	七室	灰隔类	特 例
亲王	宁康王墓	益端王及妃合葬墓	宁献王 朱权墓	淮靖王朱 瞻堞墓	益宣王及妃合葬墓	宁康王墓
		益庄王及妃合葬墓			益定王及妃合葬墓	益庄王及妃合葬墓
王妃	宁康王元 妃徐氏墓	宁康王次妃冯氏				宁康王元妃徐氏墓
夫人	宁靖王夫 人吴氏墓					宁靖王夫人吴氏墓
郡王及 妃		乐安昭定王及妃合葬墓			益藩罗川某王 (瑞懿王朱常湑)墓	
将军及 夫人		镇国将军及夫人合葬墓			奉国将军朱宸涪夫妇合葬墓	奉国将军宸涪及 刘氏合葬墓
		奉国将军妣淑人刘氏、 妣太恭人万氏合墓			辅国将军锄芸及夫人合葬墓	

施,并非初葬形式。可见,墓室填充防腐物质或使用“灰隔”是出于防患虫蚁的考虑。长江流域水位较高,常伴有虫蚁之患。石灰、松香具有防潮、防虫蚁的功效,可以达到防腐保尸的目的,因而多加利用。

通过上述类型分析可以发现,明代宗藩玄宫形制应用相对灵活,但仍存在等级差别。同一玄宫形式可被不同等级选用,同一等级也可以选用不同的玄宫形式(附表二),多室玄宫则为肇封亲王所选用,后世亲王、郡王等墓室规格随世次递减。

二、明代江西宗藩玄宫制度发展特征分析

纵观江西三藩皇室成员玄宫规制的整体发展序列,时代特征鲜明、发展特征有章可循,呈现由繁至简的演变趋势。如表一、二所示,单室、多室玄宫多在嘉靖朝以前被亲王及妃、夫人采用。其中,三藩肇封亲王墓葬基本为多室玄宫。单室玄宫集中出现于弘治时期(1488~1505年),墓室内多填充防腐物质。二室玄宫与“灰隔”类墓葬被亲王及妃、郡王、将军在不同时期所采用。其中,二室玄宫主要出现在弘治、正德、嘉靖中期,嘉靖朝以后以“灰隔”类为主。这表明,正统时期(1436~1449年)玄宫规制较高,弘治—正德时期(1488~1521年)为过渡期,此时虽有单室、二室玄宫,但规模不及正统时期。此外,“灰隔”类墓葬已于此时初露端倪;嘉靖时期(1522~1644年)玄宫规制趋于简化,以“灰隔”类墓葬居多。从全国范围考察,嘉靖改元前后,同样是明代宗藩玄宫制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①。而丧葬礼制与之具有相似的变化特征,可以此作为考证玄宫制度演变规律的旁证。

明代丧葬礼制严明,等级性突出,宗藩等级往往通过礼仪形式上的规格差别实现尊卑划分。其中,各等级所享丧葬祭礼和棺槨制度具有的时代

性、制度性较强。

在丧礼过程中,明代皇室后裔所享祭礼,因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亲王之丧于七七、下葬、百日、周年、二周年、除服之日,御祭各一坛,郡王与之相同,但郡王于百日之后行下葬礼。凡长子丧礼,于下葬、百日、周年、除服之日,御祭各一坛。郡王的嫡长孙葬礼,与祭三坛,嫡曾长孙则减为一坛。镇国将军丧礼,与世孙同。辅国将军则无同年、除服二祭,奉国将军更减去上葬、百日、周年、除服四祭,其他与镇国将军相同。至镇国、辅国、奉国中尉等级,仅享御祭一坛之礼。嘉靖朝以后,日趋简化。“凡亲王致祭旧例遣侯伯给勅行,嘉靖四十四年议罢,止差卿寺五品以上官或礼部司官前去”^②。这些凸显了等级在丧葬礼制中的核心地位,也体现了嘉靖朝为丧葬礼制变化进程中的重要拐点。

棺槨制度,历来被视为墓主等级的象征。明代,各地亲王棺制多为朱漆重棺,内棺棺木基本选用楠木。从已知棺制状况看来,江西三藩皇室多为单棺^③。其中,宁藩献王,益藩端王与妃、庄王与妃、宣王与妃、定王与妃,妃以下等级的宁靖王夫人,奉国将军朱宸涪与夫人皆为单棺,棺木均髹红漆。从棺木材质来看,宁靖王夫人棺木、益宣王及妃棺木质地为楠木,益定王及妃棺木质地为柏木。部分郡王、将军墓或因遭盗掘,或因水浸,棺木保存状况不好,具体规制不详。可见,亲王棺质规格较高,棺木材质有随时间、财力递减而降的趋势。此丧礼之别,辨明世次、区别尊卑,意在以严格的丧葬制度规范社会等级秩序,展现了明代突出的等级特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结合上文玄宫形制讨论可以认定,嘉靖朝以后,玄宫制度整体趋于简化。因此,嘉靖时期是考察明代江西宗藩玄宫制度发展变化的切入点。

三、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 变化原因的讨论

上述分析表明,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变化与丧葬礼制变化,基本具有同期性,尤以嘉靖时期的变化较为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水浅土薄加之地势多缓低,使得“灰隔”类墓葬被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则是用银工价所致。深究其理,实与宗藩人数激增所引起的经济压力有关。

明制规定,宗藩葬、祭均由政府管理。但随皇室人口不断增长,中央财政压力日益加剧。嘉靖八年(1529年)“宗室载属籍者八千二百三人”^②,至隆庆三年(1569年)“宗支入《玉牒》见存者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二位”,嘉靖朝开始,国家财政状况每况愈下,“视国初不啻千倍,即尽今岁供之输,犹不能给其半”^③。各地宗藩造坟更加剧了中央及地方的经济压力,“江西公私匱竭……意者引钱无与于民,不知存积仅二万七千余两。……淮府造坟,顺昌王、崇安王、镇国将军起第,已支五千三百余两,后来未计,此不可已者也”^④,迫使中央为缓解财政压力,多次按照等级对造坟工价进行更定。

亲王造坟工价自成化十八年(1482年)定为三百五十两后变更不大,三藩肇封亲王因地位较高、宗藩人数较少,玄宫规格也相对较高。随宗藩人数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加重,郡王及妃等级用价几经变更。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用价由十八年(1482年)的三百五十两降至一百两,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坟价一概免给”,到万历十年(1582年)恢复为一半。如弘治二年(1489年)入葬的乐安昭定郡王墓为二室玄宫,全长19.83米,规模、建制远胜万历时期益藩罗川某王墓。相比之下,将军及夫人造坟用价的变化更为突出。成化十八年(1482年)定“镇国将军并夫人二百四十五两,辅国将军并夫人、郡主,各二百二十五两……”,弘治六年(1493年)郡王以下价银减半,至万历十年(1582年)“世子坟价与郡王同。将军以下,一概停免”^⑤。正德年间入葬的奉国将军朱宸洁夫妇合葬墓为玄宫中的特殊形制,嘉靖四十年(1561年)入葬的奉国将军朱宸洁夫妇合葬墓为“灰隔”类,后者在规制上更趋简化。

同时,中央政府试图以(天顺二年,1485年)“继妃则附葬其旁,同一享堂,不许另造”、(成化十三年,1482年)“亲王并妃照旧差官开圻,郡王以下止令所在官私量备工料开圻”^⑥等诸多措施,裁减继妃造坟用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甚至奏议

继妃“不给诰命冠服,及裁减身后祭葬”,并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议准继妃“仪仗相传应用,……身后祭葬,照例裁减”^⑦,以此限制地方宗藩造坟和丧葬开销。如附表一所示,造坟工价的更定与宗藩玄宫形制的发展特征在时间上基本一致。特别是嘉靖朝以后,国家财力捉襟见肘,同时玄宫形制也呈逐渐简化的趋势。因此,宗藩人数激增,加之国家财力下降,是影响玄宫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明代中央按照等级,从地面建筑、封土高度、陵园占地面积、造坟工价、丧葬礼制等方面限制宗藩墓葬规制,以造坟工价的影响最为显著。至于嘉靖朝以后,江西地区大量使用“灰隔”类墓葬的现象,笔者认为,该形制在江西,甚至南方许多地区都有发现,故而应是江西“土薄地卑”的客观事实与民间葬俗逐渐融合于皇室丧葬观念这双重作用的结果。

通过对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进行考察,不仅可以反映明代礼制思想、丧葬制度、民间习俗,而且折射出明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相信随着更多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明代宗藩墓葬玄宫制度研究将会得到不断完善。

注释:

据《明史》记载,宣德四年(1429年)荆王朱瞻垿就藩建昌,(卷一百十九·列传第七·诸王四,第12册,第3631页,中华书局,1974年)十七年后徙封蕲州。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一六·列传第四·诸王,第12册,第3557页,中华书局,1974年。

、 、 ⑮、⑯、⑰ 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棨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城明益王墓出土文物》,《文物》1959年第1期。

郭远渭:《南昌明宁康王次妃冯氏墓》,《考古》1964年第4期。

徐兴万等:《明乐安昭定王墓清理记实》,《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① 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②、③、④ 孙家骅等:《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第522~5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下转第87页)

1997年第1期。

⑩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虎踞关、曹后村两座东晋墓》,《文物》1988年第1期。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淳化防化团、孝陵卫大栅门东晋墓》,南京市博物馆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南京历史文化新探》,第98~10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第1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⑪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马鞍山宋山东吴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7年第4期。

⑫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谷里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3期。

⑬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板桥镇杨家山西晋双室墓》,《考古》1998年第8期。

⑭、⑰、⑱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郭家山东晋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⑮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⑯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石子岗东晋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2期。

⑰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

⑲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⑳ 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幕府山六朝墓清理简报》,

《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㉔ 安然:《魂返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从墓葬和墓志看东晋的流徙士族》,《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

㉕ 《资治通鉴》卷九十七“穆帝永和二年”条。

㉖、㉗ 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第15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㉘ 《资治通鉴》卷九十七“穆帝永和十二年”条。

㉙ 《晋书》卷八《穆帝纪》。

㉚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组:《南京郊区三座东晋墓》,《考古》1983年第4期。

㉛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8期。

㉜ 贺云翱、邵磊:《南京市铁心桥王家山东晋晚期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11期。

㉝ a.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琬墓》,《文物》1998年第5期。b.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南郊六朝谢温墓》,《文物》1998年第5期;c.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区文化局:《南京司家山东晋、南朝谢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

㉞ 南京博物院:《江苏溧阳果园东晋墓》,《考古》1973年第4期。

㉟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马鞍山东晋墓清理》,《考古》1980年第6期。

㊱ 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谏壁砖瓦厂东晋墓》,《考古》1988年第7期。

(上接第92页)

⑬ (宋)朱熹:《家礼》卷四·丧礼·治葬,“作灰隔”,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点校本,第七册,第9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在“成坟”部分明确此过程为“加灰隔内外盖”,同上书第921页。

⑭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⑮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

⑯ a.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b.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196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⑰ 万为民:《江西新建朱宸涪夫妇合葬墓》,《南方文物》1992年第3期。

⑲ 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该墓玄宫特征为大拱券下另有两个小拱券,大小券间以泥土填实,与宁康王墓类似。

⑳ 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三章,第281~323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刘毅先生在该部论著中对明代藩王墓葬玄宫制度做了系统论述。

㉔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九八·礼部五六·丧礼

三,“郡王”,影印本,第551页,中华书局,1989年。

㉕ 一些文章反映宁康王为一棺一椁。推测与其玄宫形制有关。益藩罗川某郡王墓中所谓“椁室”,应该是指圹室,因此仍属于单棺之制。

㉖ (明)郑晓:《今言》卷四·二七六,李致忠点校本,第159页,中华书局,1984年。

㉗ (明)张居正:《明穆宗实录》卷三二,隆庆三年五月辛酉,校印本第50册,第843~844页,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明实录》缩微卷校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㉘ (明)林俊:《林贞肃公集》,“论宁府用琉璃疏”,见明·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八七,影印明末刊本第1册,第776页,中华书局,1962年。

㉙、㉚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卷二〇三·工部二三·坟茔,“王府坟茔”,影印本,第1020页,中华书局,1989年。

㉛ (明)李春芳等:《宗藩条例》卷上·请封生母,影印明嘉靖刻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善本丛刊》第59册,第376~37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㉜ 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180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本期导读

一、《试论徐州狮子山汉墓墓外设施与墓主问题》

《试论徐州狮子山汉墓墓外设施与墓主问题》一文主要对徐州狮子山汉墓的墓外地面设施进行了考察,总结了这些设施的特征和规律,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文献推测墓主人的身份是刘郢(客)。本文注意对考古材料进行详细的分析,以墓外设施为研究对象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论证过程详细,论点稳妥,有一定新意。文章图文并茂,注释规范,符合学术论文的要求,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二、《最后归宿还是暂时居所?——南京地区东晋中期墓葬观察》

《最后归宿还是暂时居所?——南京地区东晋中期墓葬观察》一文尝试从墓葬的功能角度来解释南京东晋中期墓葬体现的特殊面貌,既有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的详细讨论,也能结合历史背景讨论墓葬面貌发生变化的原因,论据较为充分,论点有一定新意,是一篇较有学术价值和水平的论文。

三、《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浅论》

《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浅论》一文在对明代江西藩府成员墓葬的形制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尝试探讨该地流行的玄宫制度及发生变化的原因,这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课题,希望学界朋友能就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李梅田)